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五三期 ——
(二〇〇三年九月三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0309b)

【史海钩沉】中共机密文件记录的文革广西大屠杀	吴若愚
【劫后反思】人，我们与他们	
——郑义关于广西文革吃人惨状的记载读后	龚小夏
【千秋功罪】周恩来不愧为二十世纪伟人——我读《晚年周恩来》	沈 昆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候 5c 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中共机密文件记录的文革广西大屠杀

• 吴若愚 •

(一) 大屠杀背景

1967年4月19日，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发表“四·一九”声明的大字报后，广西各群众组织大联合后分裂为两大派：“联指”（南宁联指，柳州联指，柳州铁路局钢联指，桂林联指）和“4·22”（南宁4·22，柳州造反大军，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桂林老多）。

“联指”是支韦（韦国清，广西区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的保皇派。

“4·22”则是支伍反韦的造反派。

“4·22”主要是由青年学生，市民，工人，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

“联指”则与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名义上是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

“联指”拥有现实当权者以及军队和几乎整个县乡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随着解放军“支左”介入实行军管，支持联指“坐大”。1967年秋冬，“联指”开始在广西各地成批屠杀“4·22”。八桂大地到处出现乱抓、乱斗、乱杀“4·22”的红色恐怖。发生在广西各地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野蛮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二）大屠杀概况

文革中广西大屠杀，就是“保皇派”的“联指”对“造反派”的“4·22”和同情“4·22”的群众以及无辜的“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屠杀，是以“革命”的名义的屠杀。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地区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他们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少数派——“4·22”当成“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进行镇压。

广西大屠杀始于1967年秋冬，到1968年8月达至顶峰，其屠杀规模之大（被杀者达十万之众）。杀人手段之残忍（剖腹挖肝吃人肉）在全国皆首屈一指。

1967年年底玉林“4·22”的“福绵事件”后，1968年1月4日玉林“4·22”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并静坐六天六夜。

1967年秋冬，钦州地区的灵山县“联指”的“飞虎队”在五个公社成批屠杀灵山“革联”（即4·22群众）。1968年1月18日灵山“革联”控诉团200多人第二次到首府南宁广西军区控诉灵山“联指”乱杀人的罪行，但广西军区对灵山“联指”“飞虎队”乱杀人命听而不闻，没有采取制止措施，甚至纵容“联指”对“4·22”的屠杀。因此，控诉团静坐广西军区政治部大楼前数天不走。

1月20日广西“工总”和河池地区部份群众400多人来到广西军区请愿，声援灵山“革联”控诉团，揭发各地“联指”屠杀无辜群众的罪行，抗议谴责广西军区以“支左”之名，行支一派压一派之实。

广西军区不但提供武器，在各地怂恿和鼓励“联指”对“4·22”进行武装围剿，而且还命令“4·22”放下武器，束手待毙。

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柳州铁路局工机联“4·22”《红卫兵战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作者肖晋云，因写作此文，1968年3月31日在柳州被官方逮捕），号召反对缴枪，试图武装自卫。

而广西当权派控制的《广西日报》则发表社论：今日的“哥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4月9日，《广西联指报》在一版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公开叫嚣：韦老爷（韦国清）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

遍及全广西的大屠杀如水银泻地，无远弗届，连边远山区，穷乡僻壤都未能幸免。

广西大屠杀又分为196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高潮，上半年各地以成立革委会，“刮12级台风”为第一波高潮，下半年则以“七·三”布告的颁发，掀起第二波屠杀狂潮。

中共广西区政党办公室编印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对1968年那场大屠杀，有这么一段总结概述。（被屠杀者的统计数字，仅仅是有案可查的众多失踪者，至今生死不明，不在此统计数据内）那一个又一个有体温有笑容的具体生动的生命被抽象化为一组组冷漠的数字：

1968年7月至8月一个多月中，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

宾阳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951人。贵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263人，教师156人，学生47人，居民106人，农民1311人，其它1255人。临桂县杀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其中国家干部326人。灵山县打死、杀死、害死3222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500人以上，287个大队都发生乱杀人事件。桂林市杀死、打死、害死1128人，其中：干部、工人556人，全市冤、假、错案11522起。天等县杀死、害死1651人。上思县杀害了1701人，占当时全县人口1.33%。钦州地区7个县市失踪10359人。玉林地区杀害10156人。

全区的杀人凶手，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

（三）“刮12级台风”掀起第一波屠杀高潮

1968年的广西，到处笼罩在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中。大权在握有解放军支持撑腰的“联指”对“4·22”大开杀戒。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对此有详细记录，让我们按时间顺序罗列如下：

◇ 一月至三月

2月6日玉林地区“联指”组织2000多人，配备步枪800多支，轻重机枪26挺，冲锋枪407支，各种炮八门，手枪164支，以及自制坦克一辆，攻打“4·22”州佩据点，包围两天后，攻下据点，抓获“4·22”13人，全部枪杀，在围攻时“联指”死八人，“4·22”死五人，在事件中明代建筑文物——万花楼被炸毁，炸毁民房72间，吃去国家粮食14000多斤，肉类8800多斤，耗费国家资金20000多元。

从2月7日至5月27日上思县被斗打1125人，被杀39人。

2月11日至20日，灵山召开学毛着积极分子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期间，灵城打死三人陈尸示众。大会总结号召对敌人镇压，中间有人布置杀人，新圩公社回去杀五人，第二天早赶回开会。

2月16日，“联指”攻打柳州地区融安县的铜鼓桥。由于2月9日融安“造反大军”强渡融江，攻占融安“联指”驻地的东圩、铜鼓桥和直属粮库。事件发生后，融安“联指”派人向

“地专联司”告急求援，经“地专联司”和“柳州联指”联系，“柳州联指”决定由“工交兵团”出兵支持，由“地专联司”负责组织各县民兵配合行动，12日“地专联司”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由苏一民、胡文治代表“地专联司”随往融安配合“工交兵团”行动。14日“工交兵团”和“地专联司”象州“联指”武斗人员300多人，由蒙治恒、张麦生、苏一民、胡文治等带领分乘13辆汽车赴融安，配合融安“联指”于16日凌晨一时攻打东圩、铜鼓桥，武斗持续到当天下午5时才停火。“联指”方面抓获“俘虏”36人，押解途中15人被杀害，双方对打死5人……炸毁民房一户一间，烧毁民房5户九间，厨房3间，牛栏1间。

2月25日至28日，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县区村抓促领导以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会议是武装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传达区革筹小组领导人的讲话，研究布置做好成立县革委会的准备工作。周永山在闭幕时讲，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议后实行所谓群众专政，自县抓促会议结束到县革委会成立的17天内，全县被杀害239人。

3月上旬，宜山县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联指”联合罗城、都安等县“联指”数千人围攻“造反大军”据点。8日“造反大军”的群众近万人，从城里走出时，在东片、西片被杀害多人。

3月16日天等县革委会成立，县武装部长马政华强调为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保卫新生红色政权每个乡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或坏头头。在马政华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组织策划下，从3月8日至27日的十多天里，全县发生190多起杀人事件，共杀害630多人，仅3月18日的一天发生31起杀人案件，杀害102人。祥元乡两起杀人事件，共杀46人，造成16户无男人，9户灭绝。死者农会冲的女儿，被凶手黄正建等人轮奸后强迫嫁给凶手农朝丰。死者农朝权、农良宁的妻子被强嫁给凶手黄正健、蒙加丰为妻。

3月19日崇左县武装部政委马风池到天等县，参加天等县革委会成立的代表大会。崇左县负责人张洪恩讲话说“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结果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就杀死94人。

对天等、崇左县杀人问题，在7月5日的专区革委会上，南宁军分区司令员兼南宁专区革委会副主任熊光武说：“天等县是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布局，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是好的。”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特别表扬天等县也实现一片红，号召各县“向天等学习，迅速实现一片红。”由于专区革委对天等以“杀人来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的态度，致使全专区杀人更为严重。

3月18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给军分区的情况反映（3月5日至12日）全专区共杀人2000左右，其中灵山县杀了1000多人，（注，这时在钦州地区上思县、防城县、灵山县等已杀人成风，一些大队民兵营、治保主任、公社武装部长到处鼓吹杀人）。

3月27日至5月22日，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覃锡明（原乡长）等分12批用枪棍、锄手段打死无辜群众40人，（其中未成年的12人，还有双目失明老妇人，未满10个月的婴儿）有13户男性全被杀光，杀后洗劫被杀害者财物。

3月下旬，陆川县“联指”在武装部支持下，策划对“4·22”围剿。“4·22”派被杀110人，受牵连审查一万多人，原县委书记周履光等八人被集体枪杀后，用炸药毁尸。后称“3·24”事件。

◇ 四月至六月

4月上旬，巴马瑶族自治县，“4·22”部份人从县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已圩大队革委会主任覃德强等人为首，组织民兵和“联指”数百人武装围剿少数派“4·22”，此次共杀害30户（全屯46户）杀死56人，烧毁民房44户133间（全屯140间）估计财产损失约七万多元。

4月13日，贵县举行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名单中，由于把“联指”头头当作“4·22”代表参加革委会，引起“4·22”不满，说革委会是县人武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了一个小孩刘小圈，“4·22”抬刘小圈尸体冲击大会主席台，撕毁大会横额，砸烂县革委会牌子，这就是贵县“4·13”事件。事件后贵县“联指”以“4·22”破坏红色政权为由，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并研究镇压“4·22”的方案，提出刮“12级台风”（大屠杀）。一是围攻炸毁“4·22”据点，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杀人。在10天时间里，捕了数百人，除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从“4·13”后的一个月，将关押的全部枪杀，在贵县城区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230多人。各公社效法县城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召开大会搞示范杀人。公开杀害群众38人，斗死90多人。4月1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22人，规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补助五角钱，三个民兵负责杀一个人，得三元赏钱，三个晚上共杀22人（其中杀绝五户）。杀人前进行搜刮，没收家产，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二十四人改嫁时被大队，生产队征税费和两女出嫁费共894元，有帐可查，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钱物3066.41元，全部被吃喝完。

4月14日，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在4月13日听了地区革委主任王晓峰电话会议的讲话后，召开大队及革委领导成员会议研究决定于第二天（4月15日）杀24人，4月16日又杀52人，从4月5日至五月6日杀56户92人（其中15户被杀绝，1户17人被杀13人），黄芝珍等（大队治保主任是这次大屠杀的主谋共刮死者财物2701.27元（内改嫁证明费218元，设卡哨搜人身4151元，收生产队上交杀人费1016.40元），大米769斤。

4月21日，龙州县“联指”和人武部，公检法军管会的干部武装包围“4·22”“工总”工商联据点，“俘虏”90多人，将12人作为坏头头枪杀。事件开始时，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邱玉金不同意攻打，但县革委会主任常玉善坚持要打，攻打之后杀了一批人，南宁地区不作处理。结果致使该县继续杀人，从四月至六月共打死杀死177人，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的40%。从4月23日起至29日止，玉林专区革委会召开全专区政工会议，革委会主任、军分区政委甘照寰，副主任军分区副政委孙景芳，副主任蒋昌永分别在会上讲话，会议中心内容是“反击右倾反案风”、“击退二月逆流”刮“十二级台风”（大屠杀）会议与18日公检法军管会会议一样，是乱杀人事件。陆川县部署“十二级台风”，掀起了杀人的新高潮，全县11个公社155个大队，有154个大队布置杀人，从4月26日至29日，全县共杀害1229人。城乡各地，陈尸百里。由于专区革委会布置刮“十二级台风”，全专区文革中死亡10156人，其中大部份是在刮“12级台风”中被杀害的。5月3日，区革筹、广西军区面对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情况十分惨重，不得不向个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的电报。

5月11日广西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后掌握了政权，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今天为止，全区惨遭杀害的干部，群众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军”以及

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共18000多人。

5月12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展览”（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押在“联指”总指挥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厅长）、张祖贵（原地质局处长）、黄海泉（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4·22”“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子竞等二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十个不同观点的人，身受折磨，死去活来。尔后广西“联指”搞“禽兽”展览遍及全区，受害者达10000多人。

◇ 钦州“枯那事件”

5月17日，上思县革委会常委、人武部长、公检法军管主任段振邦酿成了一宗骇人听闻的“枯那事件”，这一事件共杀害了群众和干部973人，段振邦介入地方支“左”后，标榜上思“联指”是“无产阶级革命派”，“4·22”是反动组织。是日，段振邦召开各公社领导、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以民兵“枪换肩”为名布置收缴“4·22”中民兵的枪支，装备“联指”。枯那大队“联指”民兵营长梁国雄奉段振邦之令，策划收缴“4·22”派民兵的枪支，大队治保主任宁协利拒不交枪给“联指”并开枪打死李巨才。

事件发生后，段振邦向钦州军分区谎报说，27日发现枯那大队有土匪三、四十人，全副武装伏击我民兵，疯狂向我民兵开枪射击……（见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68）军营字第10号“五月份主要敌社情况及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保卫组”《情况反映》第七期）段振邦在谎报“匪情”的同时，派副部长韩刚生率“联指”武装民兵200多人开赴枯那“剿匪”，一无所获。7月9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营弄清了事情真相，向自治区报告了实情“枯那大队并未发现土匪”。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议保卫组相应于7月25日《情况反映》第十期中，明确更正道，“我组织印的《情况反映》第七期通报上思发现土匪活动，情况经查实没有土匪活动……”澄清了事件。

但是人武部和段振邦为了实现派性杀人的目的，于8月16日又向钦州军分区报告请示广西军区，军区命令：“要搞掉他！”于是县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段振邦和驻军营长承以负责“剿匪”。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伊铭前来坐镇“剿匪”。调动本县“联指”民兵和钦州东兴县“联指”民兵及部队共1000多人包围上思“匪区”，设卡搜山，沿户清查，伏击聚歼。结果，依然没有发现一个土匪。

8月23日段振邦又生一计，由县革委会张贴“剿匪”布告。布告说：“凡窝匪，通匪，济匪者与匪同罪。”要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挖黑窝、拔钉子的清匪运动。”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会上宣布：“谁跟山上土匪有联系，一律枪毙！”这样一场指鹿为马、玉石俱焚的大屠杀，终于落到了“4·22”派和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身上，给他们冠以“通匪，济匪，窝匪”之罪名，“与枯那反革命事件”有关者通通与匪同罪，大抓大捕1671人，惨遭杀害973人，其中国家干部149人，特别严重的是枯那大队被冤杀了61名无辜的平民百姓。

5月24日地处钟山县的平桂矿务局“4·22”被围剿。贺县、钟山、富川、昭平县和梧州地市“联指”，在人武部和革委会的策动下，调集5600多人到平桂围剿只有800多人的“4·22”派群众这场围剿持续50多天时间，从5月24日开始到7月8日结束，平矿“4·22”惨遭杀害。

5月底至6月上旬，柳州“联指”为了配合“大部队”进攻柳州“造反大军”，“联指”的“保卫部”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骨干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柳州市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边杀害，共杀害有名单的42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推下

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边集体枪杀。杨兰生、杨岩生两兄弟漂流到远处上岸。而杨岩生上岸后不久，又被重新抓获，拉到河边再次杀害，尸体推下河里。“联指”的保卫部在梁国开、覃绍昌等人控制下，杀人手段比法西斯杀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6月12日桂林“联指”的“桂保总”在桂林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语录牌楼建立的一个专门关押人的“看守所”内，先后关押了25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35人，致伤致死75人。7月14日中午前来参加桂林围剿“造反大军”的平乐县武斗人员伍学强、林海、廖昌辉、候永成、唐桥生等24人，冲上“看守所”楼上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和候霉、李江、白先德、马震鹏、秦恩深等12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树林里集体枪杀。

6月19日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县委书记赵永禧等二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6月19日下午王德堂在“积代会”上作总结报告，直接策划煽动县工代会主任韦德带领一伙凶手拉赵永禧等三十多干部，教师和学生上街游斗。赵永禧等11人当场被打死，20多人被打致伤残。20日上午王德堂决定“积代会”延期一天，他向“积代会”布置杀人，公社回去后要狠抓积极斗争这个纲，决不能心慈手软。于是“积代会”后全县屠杀全面展开。王德堂在文革期间，还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共6人，如此罪大恶极的王德堂被封为“支左”的好干部。

六月至八月河池地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形成高潮，各县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关押、毒打、揪斗，杀害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全地区十个县共斗、打、逼死7864人，其中凤山、宜山、巴马、罗城、都安5个县害死千人以上。凤山县打死1300人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10%，为区、地之冠，被关押毒打数万人。

◇ 武宣大规模吃人肉事件

柳州地区武宣县，距柳州市仅90公里，虽非通衢大邑，但其地理位置十分显要，扼南下贵县、玉林，北上柳州的交通要津，红水河流经县城，又有直下西江流域的桂平、梧州的舟楫之便。

可就是在这个并非蛮荒之地的武宣县，文革期间，却上演了一幕幕疯狂野蛮的人吃人的惨剧。

1968年5月13日武宣县“联指”攻打“造反大军”（4·22），原因是5月4日武宣“红卫兵团”（造反大军）抓获桐岭公社“联指”梁达坚，并收走了120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红卫兵团”（4·22）释放了梁达坚而未退钱物，“联指”总部就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600人并请贵县“联指”300多人支援，共900多人对“造反大军”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据点，执行武装包围，打死97人毁掉房屋67间价值37900元；共有37户被抄家，抄去财物价值26600多元。自此，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联指”大规模吃“造反大军”（4·22）人肉事件。为了以正视听，这里一字不漏引用中共广西整党办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所记载的史实：

6月15日武宣县发生了大规模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将“造反大军”刘业龙，陈天掌等4人拉到三里圩游斗。在车缝社门口，刘业龙，陈天掌等四人被凶手打死。李坤寿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们的肉，拿回大队部去会餐品赏。从是日起至8月底止该县造反大军及其观点的干部群众，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野蛮者吃掉，吃人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工人农民、有国家干部和所谓的中共党员。

桐玲中学副校长黄家凭，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游击队桂支18大队长，解放后，他任苍梧县副县长。“文革”开始黄家凭被打成“叛徒”，因同情“造反大军”于7月1日晚被学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批斗杀死。翌日晨凶手黄佩农、张继锋等挖他的肝，剥他的肉，只剩下一副骨骼。接着一批人在学校宿舍巨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火烟缭绕，腥风飘荡，焦味充荡，一派阴森状令人不寒而栗。

又如7月17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四人，一帮凶手把廖天龙等四人杀死后拉尸体到平昭码头，有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码会餐。参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陈达财等23人。

该县于4月5日成立革委会，相继又成立“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和“武装纠察队”，但县革委会、人武部、“联指”、“贫联”，“武装纠察队”是穿着连裆裤的“联指”派，他们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少数派“造反大军”当“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进行镇压。

中央“七·三”布告下达后，“联指”又调动贵县、桂平县“联指”武装民兵500多人前来支持“剿匪”。几天时间“造反大军”荡然无存，打死杀死523人，其中被吃掉肉肝的75人。

挖人肝、吃人肉，是人类社会中罕见的野蛮行径。然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否定了文革，各省、自治区都积极处理了“文革”遗留问题，唯有广西原区党委继续坚持派性，美化广西在“文革”中执行一条正确路线，拒不处理武宣等县吃人肉的野蛮事件，后来中央几次追查过问，区党委竟有人说“武宣历来有吃人的习惯”公然袒护了武宣“联指”中部份人吃人肉的严重事件。这样，灵山县、贵县、武鸣华侨农场“联指”吃人肉的野蛮事件的盖子就被捂住了。

◇ 广西各地剖腹挖肝事件

据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记载除武宣县外，南宁地区的隆安县、大新县、上林县、武鸣县、钦州地区的浦北县、灵山县以及玉林地区的贵县都发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蛮事件，一一罗列为下：

1968年3月23日晚上9时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主谋策划，指挥该区高峰乡（后改为大队）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和布泉乡党支书隆秀佳两人组织民兵黄光权、冯品业等人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受玉、韦信家两人绑架到龙厚山（地名）打死后剖腹取肝、胆煮食，为了杀人灭迹还将尸体丢下深洞。这是一起野蛮杀人命事件，但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导致该区后来乱杀人、剖腹取肝的事件不断发生。

据“处遗”调查统计，该区从1968年3月下旬至5月发生杀人剖腹取肝胆的事件11起21人，其杀人手段极野蛮残忍。

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180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振坚打死后，对其未满17岁的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策划者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证明费）

5月28日，大新县昌明公社，大队民兵赵荣廷指派赵兴廷等20多个名兵抢杀何以路等3人，杀害后还剖腹取肝，陈尸野外的事件，全地区在5月、6月份共打死和迫害致死3152人。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县“联指”总部调动400多人到南宁市参加围剿“4·22”的武斗，武斗中上林“联指”有4个阵亡。上林“联指”分别于8月2日在上林县城，8月3日在巷贤区，8月7日在乔贤区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共打死“4·22”“四类分子”（地富反坏）103人，其中：8月1日打死4人，8月2日打死13人；8月3日打死13人；8月7日打死78人。杀人手段野蛮残忍、罕见。比如16岁的农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潘连标（“联指”阵亡民兵）墓地，当场枪杀陪祭。乔贤大队的蒙光忠被打死后，还被凶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楼大队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四人被打死后不准家属收尸埋葬，强迫死者亲属拿出柴火500斤，黄豆5斤，火油5斤，然后强迫潘成昌用火烧自己亲生儿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尸体，烧了两天多，他边哭边烧，泣不成声。原独山大队党支书苏兰生被塞进猪笼来回翻滚，然后凶手用铁钉把他双手钉在墙壁上致死，惨不忍睹这是一起严重的派性报复杀人事件。

武宣、灵山、贵县和武鸣华侨农场有一百多个干部群众被凶手挖肝割肉去吃个精光。贵县一个凶手还深藏两个人肝到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时候才被迫交出来。

20世纪人类的两大罪恶法西斯主义的种族清洗和共产主义的阶级清洗。而文革中广西的大屠杀、人吃人的史实证明共产主义的阶级清洗的血腥野蛮、残忍、较之法西斯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人吃人惨剧早已超出阶级仇恨的范畴，而造成对基本人性的摧毁。

（四）“七·三”布告掀起第二波屠杀狂潮

◇ “七·三”布告出笼的背景

文革之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重点是发动和依靠群众（造反派）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正是毛泽东的讲话和江青的煽动，才有后来造反派大规模冲击党政机关。

文革中周恩来总理四次接见广西两派（“联指”和“4·22”）代表，第一、二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恩来长袖善舞，和稀泥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第三次接见两派代表，周翻身手为云说广西造反派是革命群众组织。到了1968年的夏天，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头头蒯大富、聂元梓的时候，觉得造反派已经过了头了，已经失控了，毛泽东利用他们已经达到目标，可以把造反派牺牲掉了。这样在1968年夏天，周恩来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即“七·二五”讲话），周又覆手为雨地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在此之前，中央颁布的“七·三”布告，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笼的。

其时，全国已经实现全面军管，在广西，掌握实权并从未被打倒的以韦国清、欧致富为首的军方，从一开始就站在“联指”一方。对“4·22”的集体大屠杀，就是在军方的纵容甚至策划，指挥下进行的。如果说“七·三”布告前，军方还是半遮半掩地纵容和参与“联指”对“4·22”的屠杀，那么“七·三”布告之后，军方就赤裸裸亲自上阵，调遣军队对“4·22”行大规模的武装围歼。

比如1968年7月底8月初广西军区先后调动220师660团四个连，6912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炮兵第642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

对南宁“4·22”实现大规模武装围歼一役，据官方不完全统计，这一仗“4·22”被打死3795人（当场打死1471人，被俘9840人，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的有7012，其中被打死2324人）。南宁地区的宾阳县“七·三”布告后，在县革委主任，驻军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亲自布置的大屠杀，从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里，全县打死和迫害致死3951人。

河池地区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调动9个县（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三个兵工厂（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兵工厂）的人武部，民兵，“联指”武装人员会同6911部队共3000多人，围剿凤山县“4·22”一役毙杀1016人。

“七·三”布告颁发的直接原因，是缘于柳州“造反大军”抢夺援越军列。

◇ “七·三”布告颁布的缘由

1968年文革武斗如火如荼之时，正是抗美援朝打得热火朝天之际。1968年5月21日拂晓，柳州“造反大军”（4·22）头头白鉴平、廖伟严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王反修、李振岭为了对付“联指”的武装围剿，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五三八”列车调度段抢援越军列八个车皮的武装弹药，王反修、李振岭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收条。该事件令中央震惊，称“已严重干扰破坏了毛主席的文革部署”。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7月31日发出针对广西地区发生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的“布告”（习称“七·三”布告）

“七·三”布告使广西当权者如获至宝，变为他们堂而皇之大屠杀“4·22”的尚方宝剑。7月9日广西军区派出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空投“七·三”布告传单90000多份。

驻南宁柳州部队组织51个宣传队，南宁市有5000多人的宣传队进行宣传，开办660个学习班，有五万多人参加。

7月12日至8月3日《广西日报》连续发表九篇社论，都是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和一篇又一篇区革筹，广西军区负责人贯彻“七·三”布告发表的讲话。7月15日广西军区，区革筹在南宁人民公园召开15万人参加的，“坚决拥护贯彻和捍卫“七·三”布告大会，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了道路。会后“联指”在全区掀起屠杀“4·22”的狂潮将所谓“障碍”革委会成立的人（主要是指“4·22”派和地富反坏右），打死和枪杀，以此作为迎接和祝贺区革委的成立。

让我们看看广西各地大屠杀的情况：

7月15日南宁市革委，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广西军区8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所谓流窜人员，指的是各地“4·22”被“联指”围剿后进城逃命者）。他们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280多人，杀害33人，还有的人被抓之后，至今生死不明。

在桂林地市，又按照桂林的需要制定出“八·二零”公告。为此事，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代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于8月18日到桂林几次，在301部队驻地开核心会议，紧急布置军事行动，宣读解释“八·二零”公告。魏佑铸说“八·二零”公告表明依靠的是“联指”，镇压的是“4·22”桂林“老多”。

从8月20日至10月一个多月里，桂林地区（包括桂林市）被害者达数万人之多，其手段之毒辣，惨不忍睹。这是“七·三”布告这个特大事件中的一个大事件。7月17日解放军6977部队武装歼灭融安县“4·22”农总，俘虏120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支140多支，尔后又抓捕80多人。

◇ 柳江“福塘事件”

7月24日凌晨4点，忻城、来宾、武宣、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等八县和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郊区“联指”3000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造反大军”。

事情经过其严重后果是这样的。19日柳江郊区县洛满区革委会发出“洛满告急”，宣称18日上午有100多个全副武装的“4·22”暴徒包围凤山公社“联指”纠察队。呼吁柳州，河池地区各县“联指”和柳州地事“联指”派出武装支持，围歼“暴徒”。当天柳州地市“联指”发出“关于洛满区“7·18”反革命事件的严重声明”。

7月21日柳江县革委会召开常委会会议，不是对讨论“洛满告急”后问题，而是讨论几县“联指”联合武装围剿福塘“4·22”造反大军问题会议决定25日动手。会后县革委将攻打福塘的决定向军分区请示。柳州军分区请示广州军区同意攻打，并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郊、一厂“联指”武装联合攻打福塘，并成立“剿匪”指挥部。柳江县革委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任总指挥、县革委副主任刘柏生任副总指挥、人武部副部长韦熙年、蒋传璞任副总指挥。忻城县革委主任孙廷国任参谋长，柳江县原县长梁水生任后勤部长，指挥部领导成员有王有余、蔡立志、刘云虎、谢遵宜等。

7月24日凌晨4点，宋吉月命令：兵分三路，对福塘进行总攻击。然而，当时从柳州逃到福塘避难的柳州造反大军四、五十人（大部份是柳钢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23日前已逃离福塘了，只有当地“4·22”观点的农民五、六十人。在“复位”包围后，分别逃上单华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处深山里）。“联指”3000多人搜山围村，抓获70多人，立即枪杀25人，经过几天围剿后，各县“联指”大部份撤离福塘，留下部份武装人员继续清剿“残匪”。在清剿中又枪杀打死120多个农民，柳江县“保卫队”韦德金在良上村见一妇女背着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4·22”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韦德金又补了一枪，妇人含冤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见妈妈被打死后，放声大哭嚎叫，韦德金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联指”联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开支现金100400多元，粮食53583斤。

◇ 广西各地“七·三”布告颁布后屠杀情况

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对广西各地“七·三”布告颁发后的屠杀情况有如下记载：南宁地区的邕宁县6月份前死54人，在受到“右倾”的批评后，于7月16日至19日分五片召开会议（千人至万人大会），刮12级台风，结果在全县9个区同时调民兵攻打“4·22”派据点事件。全县乱杀人到8月22日止达4762人，7至9月打死947人，占该县文革期间死人数88%。凭祥市印“七·三”布告26000份，调动1056人，组成79个宣传队，办学习班78期（参加学习的2464人），在全市造成乱打，乱斗，乱杀人事件。8月5日至9月3日以凭中为重点的落实“七·三”布告为中心任务的全市中小学校，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71名教职工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其中凭中36名教师即有11名被戴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走资派”等罪名。

在南宁地区自“七·三”布告下达至10月止共揪出坏人60061人（布告公布前揪斗11685人），7月打死，逼死2738人，大战8，9月的结果。八月死5943人，九月份死1252人，两个月打死，逼死7195人占全年死亡人数40.6%。

桂林地区在“七·三”布告前全地区死亡1859人，之后死亡9087人（共计10946人），占死亡人数90%左右。桂林地区死亡9087人，南宁地区死亡7199人，两个地区在“七·三”布告后共死16282人。

在临桂县，在7月8日至7月10日，公社主任武装部长的会议上，县武装部长龙凤山批评行动慢的公社，并命令武装部长（是一个行动慢的公社武装部长）在桂林带去11个精干的民兵，限期打开局面，否则要犯政治错误。此次会议后，各公社开大会杀人，县武装部和县“联指”派人分别到各公社参加杀人大会，在杀人会上，各公社均先宣读“七·三”布告然后杀人，会议结束到7月16日共杀去36人。7月16日至月18日县“联指”“三保卫”指挥部出面开会，指出“我们这次行动就是搞‘4·22’骨干分子和各公社大队的四类分子和其它危险分子，刮他12级台风。”

胥明德也说具体对象是对立面的头头，对立面的骨干分子还有为未改造好的四类的分子等。从此次会议后到7月24日共杀100人。从7月26日至8月22日共杀96人。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召开12县民兵团及县武装部长会议，布置攻打“4·22”据点。在“八·二零”时临桂县被关押在军管会40余人（除1人在杀场中死里逃生外）均被杀害，就地枪杀或经过关押杀的无法计算。8月23日押在麻袋厂的其中9人拉出杀害。8月28日革委副主任唐申元，常委英豪分别向驻桂的公社民兵团说，要抓紧清理关押人员，要搞得对象快搞，下一步清理阶级队伍，从8月28日至9月18日又杀去89人，这样临桂县从68年6月至68年10月共被杀1783人。全州县于7月8日召开执行“七·三”布告誓师大会，7月份共开批斗会1107次，165062人，被批斗者2179人，人们说“七·三”布告成为“联指”镇压“4·22”的尚方宝剑。7月13日县革委主任说现在农村杀人比较多，要看得惯，领导要站在运动前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州县共杀人1111人，占全县死亡人数的57.4%）。

德保县贯彻“七·三”布告，把各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的办法向下贯彻。7月7日那甲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传达“七·三”布告和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精神，公社武装部长（县革委副主任）作大会报告，宣布以大队为单位，摆开战场，把所谓四类分子和“反团”（反共救国团）187人进行批斗，当场死伤19人（各占一半），燕洞公社7月18日开万人大会，被批斗者宣布罪状后个个过鬼门关，（在过关时个个被已准备好的纠察队民兵用木棍，枪托等凶器毒打），过关时206人均被毒打。各公社均采用此办法进行贯彻，到7月20日宣布全县已抓了坏人1200人。8月5日王君太主持召开县常委会，决定召开大会控诉揭发“反革命分子罗仕彦罪状会”，在讲台前跪着的“反革命”共700人，王君太一面号召刮12级台风，向敌人进行猛烈进攻，纠察队，民兵的等动手打骂，下面哭声震耳。至68年8月7日县贯彻“七·三”布告办公室宣布“七·三”布告传达后，德保县抓紧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工作。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到8月5日止，农村共揪斗干部，群众2120人，县直机关共揪斗干部职工121人，学习“七·三”布告后投案自首者200人，全县死人312人，其中贯彻“七·三”布告前98人，之后214人。

上思县革委会和武装部负责人说：“贯彻‘七·三’布告，策动全县对积极敌人实行专政，过去没有“七·三”布告，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有了“七·三”布告，就能解决上思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再次掀起群众专政的新高潮，刮‘十级台风’不行，就刮‘十二级’台风。对敌人专政，这次会内搞，会外也要搞，会内外结合。”于是会议期间共杀了两批人共23人（第一批1

1人均为国家干部)会外杀75人,共98人(会外零星杀人不计)。在贯彻“七·三”的同时贯彻区革筹清理阶级队伍指示,全县共清出“叛徒”51人,特务4人,走资派51人,反革命分子41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220人,其它坏份子835人,在清理斗死121人,逼死18人。

都安县在向专区革委报告中说:从革委成立到“七·三”布告公布,这一阶级斗争特点,主要是横扫积极敌人颠覆革委会的现行破坏活动,这一阶段全县共揪斗7367人,但更深更艰苦的斗争还是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在“七·三”布告威力下,一个“三查一清”运动迅速在全县开展起来。到8月底9月上旬共揪斗12185人,挖出61个反动组织,特别是“反团”和“中国青年党”。

北流县7月8日举行7万人参加的贯彻“七·三”布告大会。提出更猛烈地向积极敌人进攻。7月9日革委武装部作出贯彻“七·三”布告决定,说靠“七·三”布告威力揪斗“黑班子”等案。接着成立四个项目组,101,202,303,606项目组,共查清253个案件(全是错案,假案)。7月18日北流“联指”和各公社为贯彻“七·三”布告成立“七·三”指挥部。此后在全县范围内乱揪乱斗,全县被诬为“黑班子”的820人,被斗争748人,打斗至伤479人,致残62人,致死31人,打成“反团”804人,斗打致伤414人,致残139人,致死225人(其中区委书记顾德荣未得三结合,诬副书记搞反团。)该区受害500多人,致残205人,致死112人。后顾被判刑13年又翻案加刑3年共16年。

9月陆川县集中中小学校老师集训,贯彻“七·三”布告,搞斗、批、改、清理积极队伍。一大批中学老师受到摧残,陆川中学80多名教师职工被杀11人,批斗56人。未厂中学22名教职工被杀7人,陆川中学校长前后被斗120次后逝世(采用这个方法贯彻“七·三”布告清理阶级队伍的县还有,这是比66年7,8月集训老师进行批斗更为严重的又一次对教师的摧残)。

◇ 桂林市“八·二零”大屠杀

68年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主持会议,广西军区的吴华,桂林市武装部长陈秉德,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桂林市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决“4·22”桂林“老多”据点。

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在步校主持召开各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参加了会议并讲话:“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乾淨”。8月19日在104部队驻地景伯承、慕石起主持召开12县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布置了“八·二零”行动。

8月20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名义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行动前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市革委会以“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编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配备精良武器。“工纠”武装人员、各县民兵,其它“联指”成员以及反戈一击的原“造反大军”部份成员共一万多人,组编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大规模搜捕。这一错误行动,其中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8月29日陈秉德号召刮12级台风,30日全市大游斗。8月20日开始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了一个多月。

9月4日的一次游斗中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向着被游斗的对象连续开枪射击7发子弹打死6人（此人74年入党任大队支书，大队长）。

据桂林市革委会68年向区革委汇报：“八·二零”到“九·二零”一个月打死90多人。据处遗办统计“八·二零”至年底杀死160人，批斗死，游斗死94人，自杀91人，总计345人，超过1967年1月至1968年8月20日前武斗中死人267人的30%。至于各单位私立公堂，随意关押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延续的更长。

◇ 凤山“江洲惨案”

8月1日由凌云、乐业、巴马县人武部干部带领的三县“联指”武斗队和6911部队进入凤山县，会同该县“联指”和人武部中队共1000多人武装围剿“七·二九”兵团，“七·三”布告下达后“七·二九”被县人武部和“联指”当作“土匪”围剿，人马逃散到“南山”—江洲一带和“北山”—六隆一带躲藏。

这天，解放军和凌云县“联指”武装队包围了江洲洞，洞里有男女老少100多人，其中武装民兵10多人，解放军和凌云“联指”围攻三天三夜后，洞里弹尽粮绝（只有七支步枪），老人和小孩呼叫救命，于是洞里提出，保证他们人身安全，即可缴枪投降，解放军和“联指”同意。

8月3日上午，洞内派出代表黄显应，陆祖业，陆沦贵处理“谈判”，指挥围攻山洞的凌云县人武部科长卢元俊主持“和谈会议”，双方谈判结果达成协议：“洞内‘七·二九’缴枪投降，保证全部人身安全。”经双方签字后，“七·二九”先交枪，后出洞。解放军和“联指”收缴枪支后，把出洞的男女老少全部押到大队部仓库关起来。三小时后，枪杀了7人，其中一个小孩仅12岁，而后又杀害了十多人。

这就是震惊河池，百色地区的“江洲惨案”。但在十年浩劫里，却被称之为“江洲剿匪大捷”。卢元俊等人“立功受奖”。继“江洲惨案”后，解放军和“联指”又围剿北山。

◇ 广西大地“一片红”

8月21日，为了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红日照南疆，形势无限好——本报记者评述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述评广西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是区革筹，广西军区 and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阶级敌人”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从而实行了全区大地“一片红”，各专，市，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8年8月26日广西区革委会宣告成立，革委主任是韦国清，副主任是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智铭、颜景堂、曾春生、革委委员133人。

在庆祝大会上韦国清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批倒、批臭，斗倒、斗臭，要肃清国民党残渣余孽”讲话传达后，全区各地又掀起了乱杀人的新高潮。

由于广西各级革委会和人武部贯彻执行韦国清的部署，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冠以种种罪名进行镇压，大抓乱杀，问题十分严重。区革委会，广西军区于9月23日给广西各军分

区，柳州，柳铁“支左”联合办公室，220师，独立一，二师，空七军，二零分部，各边防站发出“坚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的通知”的电报。

宾阳县一面布置不要乱杀人，一面又说确实群众要求要杀的也可以杀。该县在9月以后依然继续乱杀人。

临桂县9月以后在军管会看守所关押的人不断被拉出来杀害或斗打，无人过问。至于群众杀人的事，更是时有发生。当时还有的地方在发出不准乱杀人的通知前，采取口头通知，说要快杀，过几天就不准杀人了，结果到处出现突击杀人。

广西大地确实是“一片红”——仅仅是“七·三”布告颁布至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广西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1984年“处遗”工作中，有人根据广西“文革”大屠杀事件概括道：“杀人之多，全国之冠，杀人之惨，历史罕见。”

□ 原载《北京之春》2003年8月号

~~~~~

# 【劫后反思】

人，我们与他们  
——郑义关于广西文革吃人惨状的记载读后

• 龚小夏 •

广西文革中杀人、吃人的惨状我早在一九六七、六八年便有所耳闻。那时我在广州，虽说还年轻，但已经目睹了以革命的名义对人类施行的种种残暴。一九六七年，正是全国各地杀人杀得红了眼的时候，珠江里每天都有顺水漂下来的许多广西遇害者的尸体，而广东的人们对那却也不感到有什么惊奇。受过良好现代教育的大城市的大中学生们尚且在瞬间变得杀人不眨眼，广西瘴疠之地那些信奉巫鬼的山民们吃上一些人肉又算得了什么？

为了让不太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们对当时的情形有点概念，我顺手录下了手头的研究材料中的一个段落（括号之内的文字是作者的）：

“（在广州的一场武斗中，）我们捉了X派一些人拉进纪念堂，一些坏蛋（都是受过教育的中学生）就把他们当活靶练飞刀，还割他们的耳朵……我们许多在场的XX兵（与打人者同一组织的人）都目不忍睹，有的人甚至跑到纪念堂的座椅下发抖。”

然而，尽管有人吓得发抖，却没有人去阻止这种行为。相反，那些发了抖的、尿了裤子的多数在事过境迁后会为自己那时的表现而无地自容，在众多鄙视的目光下暗自发誓若再有机会一定比那些“勇士”们还要加倍地心狠手辣。机会很快又有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果然也做到了面对血肉模糊的人体脸不变色心不跳。人性的扭曲、疯狂和灭绝在那些年头里就是这样地迅速升级。

当达尔文的进化论刚刚发表的时候，他遭到了整个文明社会近乎一致的攻击。人类，上帝的光荣的宠儿、骄傲的造物，怎么能够承认自己与那粗鄙的动物有任何血缘关系？然而，我们是否知道，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承认地球上有一个叫做“人”的生物物种的？

动物之间在必要时互相残杀，因为它们要维系本群体的存在和延续。原始民族之间在必要时互相残杀，因为他们要维系本民族、本部落的生息和繁衍。况且，被他们杀死的那些，在他们眼中看来却并非他们的同类。人类家的研究证明，几乎每个原始民族的名字，在他们本民族语言中的含义都是“人”。别的部落的名字，则相当于某种动物。打死本部落的人，那是杀人，要受到甚至比在文明社会中还要严厉不知多少倍的惩罚。而要是杀死别的部落的人呢，无非也就相当于去打了一次猎。至于将那被杀的倒霉蛋吃下去，也并非绝对不允许，有时还受到一定程度的鼓励。（本世纪中还广泛分布在从我国云南到太平洋岛屿上的猎头部落就是明证。）想想我们的祖先给我们创造的那些生动的象形文字吧：加了“犬”字边或“虫”字底的“狄”“獫狁”“蛮”等等，难道不正是象征着华夏文明周边的少数民族曾经被我们的祖宗当作“非我族类”的异物么？

文明了的人类固然有所进步，“人”的范围扩大了。但查阅一下中外的文明史，便令人怀疑这文明进步的程度究竟有多大。看看那些战争！看看那些对异族或异教徒的迫害！不知太史公在写下项王“坑秦降卒二十万”时，是否想到了那是二十万的儿子、丈夫、父亲，因而感到笔下艰涩？而文明欧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又是怎样以行猎和传播瘟疫的方式将数十万印第安野蛮人灭绝了的？翻开史书，在读到“二战期间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约三百到六百万”，或“大跃进期间饿死的人口在两千万到四千万之间”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段落时，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人类文明在几千年中有长足的进展？

人类自身那兽的基因将每一页文明史都染满了鲜血。广西发生的那些惨绝人寰的事件不过是人类之恶的再一次体现，再一次实践，再一次疯狂。

然而，问题在于，是什么鼓励了恶的横行，是什么使那些被吃的人在吃人的人眼中不再是人？

在古代，那是一种人类简单的信念：“我们”，或曰“人”，不同于“他们”，或曰“非人”。而这种“我们与他们”的观念随着文明的进展而被发扬，被系统化，被理论化，被现代化了。“科学”取代了上帝，枪弹取代了刀箭，焚尸炉取代了火刑，汗牛充栋的典籍取代了薄薄的一本《圣经》。各种各样的主义以自身为标准振振有辞地将人类残忍地剖作截然不同的“我们”与“他们”。随之而来的便是罪恶，文明的罪恶，知识的罪恶，蛮不讲理地自称掌握了终极真理而勒令全人类俯首屈从违者格杀勿论的罪恶，是古代简单的罪恶在现代社会的高级、大规模的重复。

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一桩罪恶，是以“科学共产主义”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以人类前途的名义犯下的。以这些听起来非常美好的名义，人类又一次被分成了“我们”与“他们”，分成了“阶级兄弟”和“阶级敌人”，分成了将要“获得整个世界”的和命定要被“完全彻底乾淨全部地消灭”的，分成了批斗台上的和批斗台下的，分成了劳改营里的和劳改营外的，分成了拿着枪的和被枪口所指向的，分成了该活的和该死的。广西的罪恶是那桩罪恶中最丑恶的组成部份。在那里，野蛮人类的极端残忍和文明人类的极端残忍相会合了；在那里，对灵魂的肢解直接表现为对肉体的肢解；在那里，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被嘲弄和践踏得一钱不值。

然而，如果以为只有共产主义才会犯下此等罪恶，那人们也太天真了。想想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被送上断头台的那成千上万的法兰西各阶级人民吧，那里面甚至还包括了断头台的始作俑者丹东和罗伯斯比之流！想想纳粹！想想那些千奇百怪的打着民族主义或别的什么捞什子主义旗帜的各种现代专权者！

共产主义学说并非广西或类似广西的这些现代惨剧的祸根。真正的万恶之源是将人类分成



有着一切权利的“我们”和要被剥夺一切权利的“他们”，是对所有被视作“他们”的人类的不容忍，一言以蔽之，是专制。只要存在这样的划分，只要存在着对人类另一部份的出于各种原因的歧视，只要存在对异端思想的不容忍，专制——一个人专制、阶级专制、群众专制——就可以在任何颜色的旗帜下——包括民主的旗帜下——大言不惭地进行。

为了广西的十万亡灵，我们首先要学会对思想、对他人、对“他们”的宽容。

可是，在意识形态层次上对所有思想的宽容并非等于在法律意义上对一切人类行为的宽容。正相反，思想上对异议的宽容正是以法律上对犯罪的不宽容为前提的。同样，容忍“我们”的犯罪和不容忍“他们”的存在这二者在制造罪恶时永远相辅相成。而对犯罪的宽容的最常见的表现便是对罪行的遗忘——这正是那曾经鼓励、发动、包容了各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的共产党现在所号召于人民的。因此，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能力去从法律上追究那些罪行的话，起码我们可以做到不遗忘，也不让别人——包括那些杀人犯们——遗忘。起码我们可以将它们记载下来，将它们公诸于世，以示我们对罪恶的不容忍。“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是中国的历史学家以及一切知识分子值得骄傲的传统，是他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们经受多年苦难之后能得到的唯一精神报偿。

□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

# 【千秋功罪】

周恩来不愧为二十世纪伟人  
——我读《晚年周恩来》

• 沈 昆 •

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革史料，对于理解文革年代的许多历史事件很有助益。然而我以为，大多数亲历文革的中国知识分子，读了此书后，大概只会更加理解和认同周恩来当年对于许多政治事件的处理，而对周生发更多的敬意。大凡亲历过文革的人，多少都知道周恩来历史上犯过许多错误，周也时时挂在嘴边检讨自己，因而周在人们心中从来并非一方神圣，加上周的亲民作风，当时人们对周的感情是对有血有肉的人的敬和爱，而与对毛的感情不同。这也是当年北京百万市民空巷而出送总理的原因之一。设想，如果是神去了，大概只有惊讶而少有悲痛的份儿。

高先生的书虽说批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文革史料，但却在许多关键问题上缺乏事实叙述，而以高先生自己的判断或猜测为替代。然而书中的一些判断或猜想，或由于脱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或由于考虑不全面，难免偏颇之处。本文将对书中几个主要问题加以讨论，供高先生及广大读者参考。

## 一．关于文革及文革目的

《晚年周恩来》一书显然对文革是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尽管书中提到，文革“风暴事起突然，然而却是中共立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以来社会内部积累以久的各种弊端和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但本书对文革的基调则是，毛“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刘少奇采取的先发制人之举”。且不提作为那样一场空前的（但愿也是绝后的）社会运动，必然有其人民性的一面，即便仅从毛发动文革的目的而言，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整刘少奇，若果如此，就无法解释刘倒了之后为什么毛仍要继续大搞文革。

毛在文革中多次提到，中共各级当权派脱离了广大群众，文革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其形式就是“四大”。当时的文革理论认为，共产党执政后，由于国内外的复辟势力仍然存在，特别是由于思想文化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共产党内部将会出现分化，特别是出现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因此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对几乎所有的传统思想文化都进行了批判。参照1960年代中苏论争发展过程，就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批判苏联，坚持所谓正统马列主义的必然结果。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上世纪50—60年代达到了鼎盛，但同时，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各国内部的各种矛盾也都开始暴露而且日益深化，铁托与赫鲁晓夫从执政党的角度出发对马列主义进行了一些修正，然而并不解决问题，特别是无法解决国内特权阶层亦即德热拉斯所说的新阶级的问题，而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以及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则表明苏联的行径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加之赫鲁晓夫的修正始于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这对于尊崇正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无法接受的。因而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看来，苏联的问题是其领导人背离了马列主义，而非马列主义的理论存在根本缺陷，中共的选择自然就是向左的方向发展马列主义，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经过当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同意通过的。

中共领导人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对苏联的许多做法很不以为然，延安时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加入中共的美国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在他的《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一书中曾写到1948年他到延安后即很惊奇地发现中共领导人普遍对苏联不以为然，反而对美国多有好感。因而，中共采取与苏共不同的路线和做法，并不奇怪，也谈不上是为了争共运霸主地位，实际上，书中的这一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书中多次提到，毛生怕身后落得和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因而余生一直不停地和心造的“中国的赫鲁晓夫”作徒劳无功的搏斗，一刻不得安宁。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论断，书中也没有提供任何过硬的事实。毛确实多次告诫中共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并不能就此断言毛担心的就是身后被鞭尸而非改变他的路线。实际上，毛更看重的是他的既定路线，而非死后的名声。如果毛仅为其死后的名声着想，就大可不必对林彪动手了，像林彪这样捧毛至极点而又很少拂逆毛的“亲密战友”，如敢在毛死后作赫鲁晓夫式的报告，在尊崇正统的中国，其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像赫鲁晓夫这种生前好话说尽，死后焚尸扬灰的人，是最让中国人不齿的，这也是为什么毛专爱以赫开刀的缘故之一。

## 二．文革之初的周恩来

书中说在文革前夕，“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完全被蒙在鼓里不同，周恩来由于事先有毛泽东的打招呼，心里多少有些底”，又说“周已觉察出毛对彭真日益不满的态度，而且也看出这是冲着刘少奇而来的”。但作者并未给以任何事实例举。如果周果真如作者所说，知道毛的目标是打倒刘少奇而周又事事顺毛，那周就不应该先是极力调和毛与彭，后又设法保刘，直至文革派搞出所谓如山铁证。经历过文革的人大概还会记得毛曾在文革中多次说过（大概包括对斯诺的谈话），原以为周恩来也会在文革中垮下去，却没想到周在文革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联系到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刘少奇的人马十分活跃，借再度深查高岗，彭德怀集团问题之由，大做文章，甚至企图整倒林彪。彭真尤其窜升飞速，成了不挂名的常委。只是在讨论社教23条时，毛刘交恶开始表面化。但当时彭似乎并未站在刘的一边，这从李雪峰在文革中到北京市新视为上任时讲的一段话可以透露出来，李说他是在讨论23条时发现彭真有问题，当时他认为23条是反右的，而彭认为是反左的。而23条至少在表面上是纠正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时种种过左做法的。很可能在彭看来，作为接班人的刘倒之后，他就很有可能当上接班人，至少代替周而出任总理。这大概就是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中提及“想当宰相”之故吧。当然，彭之出任总理，也可能是刘的既定方针。无论如何，几年前由于反冒进而受过狠批的周大概都是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周当然只能谨言慎行，而后

来局势逐渐明朗，周仍图缓和矛盾，确实不愧为大度宰相。

### 三．保持晚节与为国为民

书中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指导思想时保持晚节，而这种保持晚节的心态不过是带有愚忠味道的现代忠君思想。然而作者除了能举出“保持晚节”是周在文革中经常挂在嘴边的政治口头禅之外，并未提出更多举证。如果理解了本文前面所述文革的目的与文革理论，就不难理解“保持晚节”是在文革特定条件下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新考验，亦即要保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包括不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顺便说一句，现在的许多中共干部，不要说保持晚节，就连“中节”也保不了，甚至上台伊始就开始腐化堕落了。文革当中，“保持晚节”就是所谓“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着毛主席走”。这在年轻一代人看来，确实就与愚忠无二至，但如果联系中国当年的现实以及中国人自上一世纪50年代以来思想的变迁过程，也就不难理解了。

57年反右之后，大陆的中国人辨别是非对错是以党员或至多以党支部书记为准绳的，如果与党支部书记甚至党员相左，就可能被冠以反党的罪名。直到文革，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党内也有走资派，只有正确路线才能代表党，而毛的路线才是正确路线，因为只有毛是久经考验的，“跟随正确路线归根结底是跟什么人的问题”。现在提起这些，只会让人觉得荒谬可笑，但比起文革之前那种“凡是党员就代表党，就是正确的”那种樊笼桎梏来，应该是不小的进步了。也正是从这一进步开始，才有了大陆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后来的改革开放，直至共产主义的破灭，这些就是题外话了。

因而对周恩来而言，第一，毛是经过考验的正确路线代表。第二，毛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原教旨精神的。周的选择当然是跟随毛，即便不提刘少奇借派工作组之机大力扩张势力范围，侵削周的主管范围，只考虑刘在历史上种种左的做法，周也是断然不会跟随刘的。这里，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当时共产主义运动还在鼎盛时期，还不能断言共产主义只是乌托邦幻想时，周本着对其理想的追求而追随毛的路线，只能让后人在敬佩周对其理想的执着追求之外，心存一丝遗憾而已。实际上正是文革这场出自马列主义原教旨精神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苦难的社会试验，证明了马列主义的非科学性，最终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衰亡。

作者在书中也承认，周对毛取顺守之道也是出于为国家和人民办事情的缘故。我以为这才是周的主要动机。书中列举了很多事实，说明周深知对毛不能硬顶，而需缓转图之。周在其最后的两三年里，以其重病之身，忍受种种屈辱，甚至以在批儒批孔批周公中被不点名地批判来换取各行各业的整顿与恢复并进而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周这种不计个人名份与屈辱，而以国家人民为重，实在催人泪下，这实在比那些呈一时之痛快图一己之虚名而硬顶甩手不干要难得多。如果理解周的主要动机是为国为民而不是自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周在作最后一次手术前会突然起而抗争了。那是因为当时邓小平已经完全把周的工作接过去了，周也知道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为国操劳了，也就再不必采顺守之道了。

### 四．中共的党文化

中共是有严密组织纪律的革命政党，又有其特有的党文化。

这个党文化的突出一点，就是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党的利益，个人应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里讲的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这种党文化的形成，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有不可否定的重要贡献的。在这种党文化之下，党的成员，甚至包括非党员而要入党的人，

是不应该计较被错整，被冤屈的。不仅是被整的人会做如此想，明知自己的意见没错，也要绞尽脑汁检查自己不对之处，而其他的人即便同情或持类似的看法也只会为了顾全党的利益而采取批评帮助的态度，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是不可避免的。而党的利益，又往往取决于党的最高领导人，当这最高领导人是经过几十年斗争考验是尤其如此，例如毛。因此耿直如彭大将军者，智识如张闻天者，最后也都会从对毛的态度上去检讨，以致承认反党。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是入不了党的，至少成不了好党员。因此，从红军时期开始，就有无数优秀的中共党员被冤杀，错误地受整肃的则更多，中共却从来不把这种错误放在第一位去反省。像黄克诚那样在庐山会议上为彭德怀仗义直言者，大概在中共高层中，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了。李敦白在本文上面所提到的书中，对他是怎样从一个既追求共产主义又崇尚个人的价值和自由的美国共产主义者，成为中共党员之初与中共的这种的文化多有碰撞之处，到后来如何身陷冤狱而仍苦苦反省自己，及至文革初期才觉得重新找到了个人价值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曾有很生动的描写。

中共党文化的另一大特点叫做“相信组织相信党”，这一条主要是把人置于无能为力的地位，无论是争辩什么理论问题或是为什么人作无错辩解，只要“党”不同意或不愿听你的，就可以用一句“相信组织相信党”使你解除最后一点武装。但这个笼统的“党”实在太抽象，总得落实到党的“法人”代表身上，文革前是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文革中则只有毛和中央里少数紧跟毛的一些人了。在一些特别情况下，有些工作人员也可享用这一有利地位，例如特派员，联络代表，专案调查人员等，既是上头委派的，就应该相信。甚至位高如周恩来者，在专案组摆出的各种证据面前，既然周不可能亲自去调查，也就只有“相信组织相信党”而签字认可的份儿了。

中共的党文化中，还有很多丑陋的东西，不过以上两条大概是最能迷惑人最能使人变成工具的了。

## 五．周恩来与林彪事件

作者在书中暗示，周与毛联手逼走了林彪，而周在林死之后大恸是怕成了二号人物的自己将会不保。这些判断与书中所叙其他事实，多有矛盾之处，推理也欠周全。本人根据书中所述，则得出了完全不同的推断。

周与林共事几十年，对林的为人应该是清楚的。周对于党内斗争一贯是以平息缓和为主导的，提林彪为接班人，一来林在60年代是挺毛最力的，当时也最得毛的欣赏；二来林彪为人向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而不会像刘少奇那样有架空毛的可能。加之林是做实际工作出身，治国理念与周相同。因此以林为接班人，毛大概就不大会再次发动废太子的党内斗争了，而把林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也就可避免围绕接班人的党内权争，从而作为实际工作主管的周也就会有更大空间去实现强国富民的抱负。却没想到即便如此，仍不能避免废太子的内斗。周仍是按其一贯做法，尽力调和毛林二人，却无法成功。在种情况下，对周而言最好的结果是林到其实力地盘称病告假，毛既无法动林，林也不再视事，可以避免矛盾的公开化。

按照周对林的了解，应该知道林是民族主义者，不会往苏联跑，而是到广州的亲信部下处避祸，林如到了广州，毛大概不易抓人，事情就容易和缓下来。这大概就是周接了林立衡的报告后并未着力禁飞的缘故（果如此的话）。说林彪到广州是要搞军事割据，实在太欠证据，林如有军事割据的计划，不能不与他的亲信事先通气，可是查了这么多年，竟未见任何如是供词。林不会不知道，在当时的中国，与毛公开对抗，尤其是在军事上公开反叛，只会落得身败名裂，但若避在广州不让8341抓人则是可行的。因而当周得知林往北飞时，先是紧张，得知林机毁人亡后则说这是最好的结果，全是为当时的大局考虑。当平静下来之后，则不免忧心忡忡，

被人引起话题，忧伤更重，以至于大恸。周实不是哭自己，哭林彪，而是哭中共！周在56年因反冒进而被狠整，几乎不保，也不过暗自落泪。前面说了，立了林彪作接班人，多数人都以为可以相安无事了，却不料最后也是大斗一场。周大概已经看出在毛的有生之年，围绕接班人的党内斗争是无法平息了，而这种不断的内斗将最终毁掉他为之奋斗了终身的强国富民的事业和抱负。以周的聪慧和洞察能力，加上他为共产主义奋斗几十年的经验，周大概应该感觉到他当时所经历的共产主义实践已经越来越远离他早年所向往的救国救民之路，尽管他竭尽心力仍无法避免陷国家与人民于灾难的结果，痛惜，伤悲等诸多情感集于一时以致大恸。然而，周在大恸之后，仍然打起精神，忍受种种屈辱与打击，继续为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而鞠躬尽瘁，奋斗不已。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仍勉力为之的诸葛亮精神要比许多顺境下的成功者更让人敬佩万分。

## 六．周恩来做事的风格

在很多人看来，周之事毛，犹如奴才事主子，简直是卑躬屈节，丢面子极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周恩来做事情的风格罢了，亦即，无论巨细事必躬亲，专注认真绝无疏漏，对人则体贴入微。当然对于为身系全党全国命运的毛处理安排接见红卫兵这样的事情就更得万无一失了。书中所举周跪在地上为毛指地图，我以为，其一是周办事专注认真，其二大概是为了方便，因为我们自己有时为了方便也会跪在地上做事情。

实际上，周恩来有时对其他人也会不计尊卑地行事。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清华，与学生发生冲突，毛决定在人大大会堂招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由于在冲突后撤出了清华，很晚才辗转接到通知，到人大大会堂时已是28日晨七点多，由于当时下过雨，蒯又是从清华北便门经一片农田撤出的，裤腿上尽是泥水，裤脚挽到了膝盖上，样子十分狼狈。周总理当时在人大大会堂门口等候蒯大富，见到蒯，周就迎上前去帮蒯把裤脚放下，并尽量把泥土拍掉。难道周还须对即将被整肃的蒯大富献殷勤吗？

前面所提李敦白的书中也有类似的叙述，一次李氏夫妇带了两个女儿去看演出，坐在周的最后一排，李的一个女儿正好坐在周的后面，被周挡了视线，就有点儿闹，周听见之后就转过身把李的女儿抱在身体上看节目，李的另一个女儿见了，也吵着要前面的伯伯抱，周就又转过身把这个也抱过来，就这样一左一右抱着李的两个女儿看完表演。这类事大概还有很多。周恩来大概是历来中共领导人中最不讲尊卑贵贱，地位高下的一个。这也是周在民间的魅力所在。中共声称以消灭阶级追求平等为目标，然而经过中共几十年的统治，眼下的中国大概是除了少数皇权国家之外，世界上最讲尊卑贵贱地位高低而级别森严的国家之一。可悲的是，有些以追求民主平等为己任的人士竟也时不时地用等级观念的有色眼镜看事物。

## 七．周与邓及其他人

毛曾说过，要能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又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毛大概自诩是做到了这一点，而实际上反对过毛的人大都不能与毛共事到善终，多数会被毛算总账的。周大概是例外，但这多半是因为周的缘故，而在毛的那面，如书中所叙，毛直至死之前还仍是耿耿于怀。

周是真正做到团结一切人共同工作的少数中共领导人之一，无论是延安整风时狠批他的那些人还是57年批反冒进时帮毛整他的人，包括那些觊觎总理位置随时准备代替周的人，周都能很好地与他们共事，绝少计较个人恩怨。邓小平在复出之际的批周会上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高先生认为是诛心之论，周恩来大概只当它是忠告，并未丝毫影响他对邓的支持和配合，甚至在周病重临去之前仍尽力担当为邓减轻压力。

顺便说一句，邓的话，如果丝毫没有暗讽毛的帝王思想之意（我以为邓绝无此意）的话，就只能表明，不能也不允许挑战毛，早已经是中共高层的共识。不仅对邓如此，对那些一心想搞倒周的人，如张春桥之类，周也是尽力和缓矛盾说服他们。周恩来追悼会上的一幕，我自今历历在目，追悼会进入尾声后，中央领导人依次走到邓颖超面前与她握手，当张春桥与邓颖超握手时，邓颖超对张春桥足足述说了好几分钟，张春桥铁着脸只有点头的份儿。大概是周以他临终嘱托的形式再次规劝正在反回潮兴头上的张吧。遗憾的是，二十几年过去了，竟无任何只言片语公诸于世。

正是由于周的这种风格，无论哪个山头的人都不得不敬重他。

## 八．周恩来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

尽管毛泽东一生中斗败了他所有的政敌，但毛只能算是瘸腿的政治家。毛搞政治偏好于斗，甚至动则要上井冈山，重起武斗。毛的政治完全服从于他的政治理论，事情办的怎么样倒还在其次。政治的本意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通过各种机动而把事情办成功。周恩来则是这方面难得的巨匠。特别是当今世界，和平民主已经成为主流，就更是需要像周恩来这样善于妥协而求同存异的政治家。周恩来被毛贬为经验主义者，终生为此作检讨。实际上，中国倒是少了些周这样的经验主义者，而吃过太多理论家们的亏。直至今日，还是有那么一批人，仍旧迷恋于这个主义，那个理论，再不济也得弄出个什么思想来，津津有味，乐此不疲。相比之下，周恩来身处共产主义还未被最后证实是错误的时代，又有毛这个不可挑战的伟大领袖和“天才理论家”的强力制约，能够通过种种机动和努力，使中国避免了战乱和分裂而最终确定了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方向，周恩来确实不愧为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

周恩来以他第一流的聪明才智，高超干练的办事能力，忘我的献身精神，勤勉专注的工作作风，严于自省的谦虚美德，对人宽容的宰相胸怀，不计尊卑高下的亲民风格，令人倾倒的魅人风度，以及他追求理想的执着，都使周无愧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他的评语：“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然而，无庸讳言，作为血肉之躯的人，周自有他自己的弱点，犯过种种错误，其中有些可能难于为后人所理解和原谅。周所身处的时代，确定了周不得不经常在人性和他所被卷入的共产主义实践之间的巨大冲突所造成的剧烈痛苦中煎熬。这种痛苦与煎熬只会引起人们的同情而增添对周的敬意。

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把人们带回那个癫狂的年代，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文化大革命，吸取历史教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作者的一些推论和判断还值得进一步推敲和讨论。令人感到略有遗憾的是，此书与《天安门事件真相》一样，对于一些关键事件和问题，书中并无事实例证，而只能以作者的猜测和判断为代替，因而仍然无法确定事件的真相。除了本文上面提到的文革起因，林彪事件的许多细节等事例之外，还有诸如张春桥对“天才”问题的发难，毛在73年因中美关系转热而批周投降主义的真实原因，等等。前者，张春桥若未探到毛的底线，大概绝无胆量在这一问题上发难。后者，看似毛的小题大做，是否与当年毛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及《别了，司徒雷登》时的情结有关，据说当时很多中共领导人倾向于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甚至包括林彪在内。这些都还有待于作者和其他历史工作者进一步研究和发掘了。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